

黄正林

主编

从深处看历史：

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与经济社会

CONG SHEN CHU KAN LI SHI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 编

**从深处看历史：
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与经济社会**

主编 黄正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深处看历史: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与经济社会/黄正林主编.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5

ISBN 978-7-81091-814-5

I. 从… II. 黄… III. ①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文集 ②经济史—中国—近代—文集 ③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文集 IV. D092.5—53
F1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0299 号

责任编辑 贾怀廷

责任校对 田 园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开封市精彩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90 千字

定 价 5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李振宏

眼前的这本文集,是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三年来的一个学术总结,也是该所为学界交上的一份令人欣喜的答卷。编者约我作序,吾甚为感奋,欣然应允。翻阅这几十篇文稿,真的是感触颇多,愿以几点浅见向学术界推荐。

河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是一个年轻人居多的团队。年轻人思维敏锐、视野开阔的特点,为这本文集烙上了突出印记。所选论文涉及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社会经济史、妇女史、根据地史等诸多研究领域,尤以社会经济史研究最为集中。社会史研究,就中国史学界的情况说,兴盛于上世纪90年代,成就斐然。但就发展到目前的情况看,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选题碎化就是问题之一。我们时常见到一些非常具体细微的研究题目,研究一个村庄、一个家族、某个确定年代的具体事件等等,并且就事论事,将研究目光局限在历史的细枝末节之中。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有什么助益呢?应该说,任何具体细微的问题都可以研究,但问题是,任何具体细微的历史现象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也只是社会整体历史中的一个具体,是中国历史整体的一部分,因此,具体的细微的局部的历史现象的研究价值,也就在于可以通过它而一叶知秋,因微见著,可以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关照到中国历史的整体。不能关照整体历史认识的具体研究,终归没有太大的认识价值。我们面前的这本文集,也有不少研究具体问题的选题,而他们就在社会史研究方面贯穿了一种很好的方法论,避免了具体问题碎化研究之流弊,达到了以小见大的认识效果。比如《近代西北皮毛产地及流通市场研究》一文,就社会经济史这个比较广阔的研究领域来说,单纯的皮毛市场研究,应该是个单一而很细微的选题,况且又局限于西北一隅。然而,作者却将其西北皮毛市场研究与近代西北区域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近代西北经济结构的转型乃至近代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等等联系起来,以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关照到诸多宏观的社会经济史领域,收到了因微见著之效。试看作者的如下议论:

近代以来,随着天津以及北方其他城市开埠,中国逐渐成为列强掠夺原料的市场,西北皮毛成为列强在中国掠夺的原料之一,由此皮毛作为出口商品通过天津和新疆各口岸运销到欧美、日本、俄罗斯等国。在西北皮毛的市场链中,以产地市场为基础,以中转市场为枢纽,以出口市场为尾间,形成了

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通过对西北皮毛市场链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皮毛市场的兴起对西北区域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西北皮毛市场体系的形成,使西北经济结构“由传统的封闭型畜牧生产结构逐步地向近现代化的外向型生产结构转化的过程之中”,增加了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因素。尽管如此,近代中国毕竟是一个丧失了多种主权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地位,这种处境就决定了西北皮毛在国际市场上的被动地位,即西北皮毛市场随着国际市场的兴衰和需求而发生波动。

像这样以小见大、因微见著的社会史研究,文集中不少论文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如《同治回民事变后黄河上游区域的人口与社会经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建立家务活动研究》等,都很好地实现了这样的认识效果。

该书所体现的实证研究学风也值得提倡。本来,历史研究就是实证研究,言必有据、论从史出是基本的要求,坚持和体现务实求是、立论有据的实证学风不需要特别张扬。但是,就目前学界的学风说,该书所体现的这一治学原则则成了他们的一种风格。自从历史研究手段有了电子化的改善,特别体现在一些年轻学人身上的学风就开始有了改变,不读书而著书立说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不少人的资料来源主要就靠电脑检索之途径。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资料搜集的非全面性。有人认为电脑检索真正实现了传统治学对资料一网打尽、竭泽而渔的理想化要求,而他们却忽略了中国传统文献语言模糊性的特点,自己所绞尽脑汁设计的尽可能全面的关键词,也仍然无法将某些有用的甚至非常宝贵的资料检索出来。没有系统的文献阅读,要做出真正的学问是不可能的。二是单纯的电子搜索,使我们所检索到的资料脱离了原书的语言环境,可能使我们无法窥知资料的丰富内涵,甚至对其做出偏颇的理解。这样,不读书单靠电子检索渠道去获得研究资料,对于做学问来说,就成为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在眼前的这本文集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这种现象的任何痕迹。我仔细查阅了每篇论文的参考文献和他们从该文献中获取的材料,发现这些材料都不是靠单纯的电子检索手段取得的,而是靠不折不扣的深度阅读获得的。这是说的他们获取资料的途径和做研究的科学态度问题,就资料征引的广泛性上说,也是值得赞许的。在这方面,黄正林教授的几篇论文都可为典范,除此之外,像张艳的《科学技术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柳岳武的《道、咸、同时期清廷属国政策之研究》、赵金康的《试论 1927—1937 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体制》、郭常英的《传统社会心理对汪康年政治态度的影响》、翁有为的《政府法制化的艰难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专员区公署制的推行及变化》、张莲波的《五四时期的妇女经济独立思潮》等文,都是值得称道的。

我本人不是做近现代史研究的,文集中讨论的所有问题,都在我的学术视野之外,从研究内容和学术观点的角度,我是没有资格发表意见的,所以,我仅是从方法论和做学问的科学态度的角度谈了一些粗浅的看法,至于文集在学术思想

上的建树或不足,就留给广大读者自己去做出判断了。

河南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队伍,最近十年来因为各种原因变得有些薄弱,黄正林教授应聘这个学科的黄河学者岗位,是肩负了该学术团队重建和发展的使命的,学校和学院都对他寄予厚望,并为之成立了以他为所长的“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这本文集便是这个研究所成立3年来研究成果的一个方面的结晶。文集的出版和其达到的学术水平说明,黄正林教授为这个学术团队的建设所付出的劳动,已结出正果,并日益丰硕。我感佩于他们的成长和进取,谨以以上文字,作为对他们的美好祝愿,愿他们以更加科学的态度,严谨的学风,优异的成果,大放异彩于当代中国史坛,尽早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广泛认可的优秀学术群体。是为盼!

2008年12月25日

目 录

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	
——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黄正林(1)
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研究	
.....	翁有为(15)
抗日战争初期刘少奇对华北局势和中共在华北中心工作的思考	
——读《杨尚昆回忆录》	翁有为(29)
1937—1945 年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改造	黄正林(38)
科学技术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张 艳(60)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退伍军人安置问题研究	宿志刚(77)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代耕问题研究	宿志刚(96)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建立家务活动研究	宿志刚(109)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	黄正林(121)
笔谈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	翁有为 张 艳 黄正林 郭常英(135)
国际关系演变视角下的中日甲午战争与中对西认知	翁有为(140)
民国时期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及其知识背景	翁有为(148)
南京政府征询社会制定“五五宪草”和刑法的考察	赵金康(162)
试论 1927—1937 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体制	赵金康(168)
传统社会心理对汪康年政治态度的影响	郭常英 张秀丽(178)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制定缘由考论	翁有为(190)
政府法制化的艰难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专员区公署制的推行及	
变化	翁有为(201)
近世西人眼中的清朝司法	柳岳武(214)
道、咸、同时期清廷属国政策之研究	柳岳武(228)
近代西北皮毛产地及流通市场研究	黄正林(239)
同治回民事变后黄河上游区域的人口与社会经济	黄正林(258)

民国时期宁夏农村经济研究	黄正林(277)
民主改革前安多藏族部落的草山权属与牲畜租佃关系	黄正林(292)
五四“启蒙运动”说的历史考辨	张 艳(307)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解读	张 艳(321)
建党初期共产党人对女权运动的指导	张莲波(330)
五四时期的妇女经济独立思潮	张莲波(340)
试论雷经天的司法思想	赵金康(347)
《平民教育》倡导的平等主义教育精神	郭常英(356)
日本学校唱歌对李叔同学堂乐歌创作的影响	郭常英(360)
清末报刊对世界妇女运动的报道及其对中国妇女运动的启蒙 作用	赵广军(365)
伟烈亚力的汉学成就述评	胡优静(377)
后记	(388)

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

——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黄正林

作者简介:黄正林,甘肃环县人,教授,历史学博士。1988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河北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南大学“黄河学者”,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出版专著4部,发表论文50余篇。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

社会教育是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实施这一政策的方法是以乡村社区为单位,以冬学、夜校、半日校、识字组、读报组、民众教育馆、秧歌队、剧团等为组织形式,目标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对民众灌输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中共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其终极目的是要民众对中共政权以及各项政策有一个最大限度的认可。关于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只注重了对扫盲教育的研究^①,而忽视了社会教育与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的问题。事实上,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中共在根据地进行的全面深入的政治动员,而后者显得更突出、更重要。通过社会教育,根据地的民众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洗礼,从而成为中共各项政策的拥护者和践行者。通过社会教育使中共实现了对根据地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本文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对社会教育与抗战时期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等问题进行论述。

一 问题的提出

自近代社会以来,随着封建王朝权威的式微,乡村社会逐渐摆脱了王朝权威的控制和影响,出现了乡村政权为乡村精英所把持的状况。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① 如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2卷,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变。陕、甘边界的黄土高原地区,交通不便,沟壑纵横,山地崎岖,把民众聚落自然分开,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乡村社区。其远离国家主要权力中心,久而久之,乡村权力为一些乡村精英所把持。旧乡村精英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第一,绅士阶层。他们大多数是前清秀才或在私塾中受过旧式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村民与文字有关的事务主要由他们来张罗,如订立契约文书、撰写各种节日对联、主持村庄的婚丧仪式以及对一些礼节的诠释等,因此在乡村有较高的威望,受到村民的尊重,他们是主要的乡村权威。如1933年对陕西农村调查所得到的结论:“一般来说,现在陕西乡村中握有政治权的,还是比较年老的乡村绅士们。”^①第二,乡村强人。他们原本身份是农民,或失去土地,或与官府、地主豪绅结仇,由此啸聚山林,随着势力的强大逐渐控制了部分乡村社区。他们有的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在抗击官府的苛捐杂税和外来势力方面得到了乡村民众的信赖和拥护,逐渐成为号令一方的乡村精英。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首领投靠了国民党地方政权,做了地方民团的大小头目,和国民党地方政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司令庄庄有,副官满院走,官长多如狗”^②,就是这种乡村社会现状最真实的写照。第三,哥老会和其他秘密会社的头目。这些会社的头目被称之为“大爷”,其成分十分复杂,有的是缙绅;有的是团首。他们不仅在各自的会社里有号召力,而且在乡村社区内也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控制着乡村社区的一切权力^③。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就面临着这些根深蒂固的旧乡村权威的挑战。

在十年内战时期,著名的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交界地区就是利用了这种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形,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他们在这里领导土地革命,在很小的范围内触动了旧的乡村权威,建立了以贫苦农民为基础的新政权。1935年10月后,中共中央和数万红军在南方失去根据地,经过长征来到陕甘地区,使刘、谢创建的根据地扩大了数倍。在红军控制的县、区、乡、村都建立了政权,一些在土地革命中的积极分子陆续加入了党的组织,成为乡村新政权的主要成员。这些新政权的支撑者在分配地主土地和浮财方面表现积极,但“许多乡长是不识字的农民积极分子,其世界观、经验和个人关系都建立在当地的社区之上,其革命眼光所及既限于较早时期的土地革命”^④。

同时,也要看到,在中共建立的新的权力网络中,特别是在县级以上的政权

①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49页。

② 华池县志编写领导小组:《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③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甲1,内部馆藏本,1993年印行,第9页。

④ [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页。

机关中,其主要职务(如县委书记、县长)大多由操着外地口音的红军干部来担任。由于长期受到地方强人“保境安民”口号和抵制外部势力(包括官府)的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当地民众在心理上不可能如此快地接受“外人”的统治,即他们对操着外地口音的红军领导者表示出了怀疑甚至不信任,即使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的乡村积极分子心里也不踏实,许多党员仍旧与哥老会和佛教有关联,怀疑政府和外来组织形式的权威^①,他们要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如环县是中共政权建立比较早的地区,1936年6月,中央红军西征时解放,不但建立了县、区、乡、村政权,而且由李富春担任书记的陕甘宁省委就设在环县的一个叫河连湾的小村子。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中共具有四年半政权建设历史的地方,1941年初发生了大规模叛变事件——“环县事变”。事变的主谋叫赵思忠(外号赵老五),农民出身,18岁时家庭遭到土匪洗劫后,他躲避在深山里,20岁返回家乡,利用其二哥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关系搞到一些枪支,以防匪为名,拉起了民团^②。在中共官方的记载中,赵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因为他专门杀害紧跟共产党的乡村干部。但民间说他是一个“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人,对当地民众很讲义气,因而在环县北部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在当地一些乡村政权中,许多干部表现出“二元”面孔,即表面上是中共乡村政权的干部,实际上听从赵的指挥,甚至一些乡村和区的干部投靠了赵,进而由赵安插人把持中共基层政权。他们说:“八路军来了,我们是共产党;赵老五来了,我们还是自己人。”^③1941年1月,中共环县基层政权的17个乡的民众,2000多名自卫军随土匪赵思忠哗变^④。其中有“二百多个共产党员(占全县1/4),三十多个乡级干部以至个别区级干部直接参加与领导了这次叛乱”^⑤。这次事变的发生,反映了抗战初期中共乡村政权在经过了土地革命的老根据地并不是十分稳固,其根本原因在于边区的乡村政权还没有完全取得大多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陕甘宁边区未经历过土地革命地区的情形又如何?边区未经过土地分配的地区是在国内和平局面出现后建立了统一战线的环境下形成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出现了和平的局面。为了表示与国民党再次合作的诚意,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中共向国民党做出了包括“停止没收地主土

① 白向银:《在转变中的安塞工作》,《团结》第1卷第9期,1938年9月出版。

② 环县志编纂委员会:《环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③ 李卓然:《论环县事变的教训》,《共产党人》第8期,1940年7月出版。

④ 高岗、王世泰:《关于环县自卫军叛变情况给林伯渠高自立的报告》(1940年2月25日),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上),内部资料,1992年,第105页。

⑤ 李卓然:《论环县事变的教训》,《共产党人》第8期,1940年7月出版。

地之政策”在内的四项保证后^①，立即发布文告停止苏维埃时期的土地政策。这样，陕甘宁边区的一些地区保留了旧的土地制度。在未分配土地的地区，地主土地制度仍然存在，地主、缙绅仍然有很大的势力，甚至左右着这些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特别是在中共建立“三三制”政权后，一些地主、绅士参与到各级政权中来，影响着中共政策在乡村社会的实施。减租减息政策在这些地区难以展开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抗战伊始，中共就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但直到1942年时，这一政策还是不能在陕甘宁边区彻底落实。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旧权威在边区乡村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地主利用在乡村的地位抗拒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的落实^②。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乡村，地主不仅在经济上有实力，有些乡村的政权依然执掌在地主手中。如绥德县辛店区的一个乡，其政权一直把持在地主手中。1940年中共在绥德就公开建立了政权，但四个年头过去了，这个乡还没有中共党员和党组织，因此在1943年7月的乡选中仍然选了一个破落地主担任乡长。为什么不选举穷人当乡长？当地的民众解释说：“穷人没知识，吃不倒财主，怕负担派不出去。”^③由于穷人没有知识，在乡村也没有权威，只有将乡村权力让给地主。

中共在边区面临的另一问题是农民对政治的冷漠。由于世代生活在黄土高原的深山大沟里，长期与外界缺乏沟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非常淡漠，特别是边区没有受到日军的直接蹂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动员农民投入抗日运动以及参加中共政权组织下的一切抗日活动都是比较困难的。不仅如此，对能够给农民带来直接利益的政策如识字、减租减息、生产运动等也表现出参与不积极。农民害怕识字后成为“公家人”，有些农民自己不愿识字，也不让孩子读书识字，有的送孩子上学时，认为自家孩子从此成为“公家人”而“痛哭流涕”^④。在减租运动中，“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农民，在生计胁迫下，不得不给地主让步，有的和地主串通隐瞒政府，有的互相争租夺佃，在部分农民中间还流行着一些落后保守、不相信自己力量和不完全相信新政权的力量情绪”^⑤。农民的这种参与政治的冷漠，有碍于中共一切政策在乡村的贯彻。也就是说，在多

①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85—386页。

②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二），甲4，内部馆存本，1994年印行，第206页。

③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二），甲4，第187页。

④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0页。

⑤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4页。

大程度上取得农民的积极参与,关系到中共政权在乡村社会的稳定程度。

总之,一方面,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扶持起来的积极分子由于自身存在着一些弱点,如多数乡村干部不识字,不能完全理解党的政策,还不能完全胜任党交给他们的任务,甚至有些党的干部在当地扮演着“两面派”的角色;另一方面,在中共掌握政权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没有进行土地革命的地区,旧势力在乡村社会仍然可以呼风唤雨,乡村民众还没有完全与旧势力剥离关系,游移在抗日民主政权和旧势力之间,对抗日民主政权所宣传和执行的政策还持怀疑态度。对于依附于国民党地方政权的政治土匪,中共动用军队进行武力清剿,这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但对于乡村士绅,中共在抗战爆发前夕就有承诺,既不能采取镇压的手段,也不能没收其土地和财产,在经济上还不能完全削弱他们。而且中共在根据地建立的是“三三制”民主政权,使他们不仅在经济上保有原来的大部分财富,而且在政治上享有一定的权利,一些人还依靠自己的威望和财力进入了中共乡村政权的中心。

如何解决乡村政权中存在的问题?如何使民众实现对中共政权的认同?如何使广大农民有参与政治的热情和积极性?一方面,中共给了广大农民看得见的实惠,如抗战初期的免除赋税,与民休息的政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各根据地实行比较彻底的减租减息运动,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从中获得了利益。另一方面,中共加强了对根据地民众的意识形态教育,即选择了对民众实施社会教育的方法,它不仅使农民粗识文字,更重要的是用一种新的文化道德观念取代旧的文化道德观念,使广大民众实现对中共政权的认同,使中共政权扎根于乡村社会。

二 社会教育的目标

社会教育的一个目标是消除文盲,提高边区民众的文化水平。陕甘宁边区是一个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地区,曾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对边区的乡村社会作了这样的描述:“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 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 60%,成人达 3%;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①。林伯渠也指出,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66 页。

边区的“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极其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边区）人口的百分之一”^①。大量文盲的存在，既不利于抗日战争的进行，也不利于中共政策在抗日根据地的实施，从长远利益看，更制约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为了补救根据地民众在文化知识方面的缺失，中共十分重视对民众的扫盲教育。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边区政府就指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全国一致的抗日战线和全国一致的民主政治，首先在自己直接领导的陕甘宁特区建立抗日的模范。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②1939年又强调指出：“在目前抗战正向新阶段发展的时候，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灌输以抗战的必要知识，大量消灭文盲，是非常迫切的任务。”^③因此，抗战时期的扫盲教育实质上是一次文化启蒙运动。

社会教育的另一个目标是给民众灌输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激发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1938年，边区政府的有关文件规定，国防教育的目的是：“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胜利信心和增加抗战的知识技能，以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训练千百万优良的抗战干部，培养将来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建设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④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外，对广大民众则通过半工半读的社会教育来实现。1942年边区把社教中各种形式的识字运动，扩大为进行一般的社会教育，“要在教课中间联系到边区的一些实际问题（征粮、乡选、发展生产等），使学生认识到的字和听到的真理，真正与他们的公私生活息息相关”^⑤。1943年明确指示：“社会教育要和各县其他工作任务紧密配合，像生产运动、防奸自卫、拥军、拥政、爱民运动、减租减息等。在这些工作中，有计划的组织社教活动，对群众进行教育。”^⑥各地也相应地做出同样的规定，如陇东分区决定：“社会教育的内容，以生产拥军民主建设为中心。教材以政府下发的政策法规宣传解释。生产方面，最好由民教馆吸收民间生产的歌谣小调，加以整理，编成教材来教。民主建设以解释施政纲领为主。”^⑦绥德分区“以公民课作为一切课程的中心，并根据社会工作的具体内容来确定公民课的中心内容”^⑧。强化政治教育是边区社会教育的特点。因此，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是对民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页。

②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2页。

③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81页。

④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第1页。

⑤ 《今年办的冬学》（社论），《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4日。

⑥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新华日报》1944年6月6、7、8日。

⑦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下），第389页。

⑧ 《绥德教育讨论会决定国民教育为工农兵服务》，《解放日报》1944年2月24日。

众的意识形态教育,是在根据地的一次政治启蒙运动。

由于社会教育是为了提高民众的识字能力和对中共政权的亲和力,因此,社会教育的受众不仅是不能脱离生产的文盲、“半文盲”大众,而且不能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也在受教育之列。对于文盲和半文盲“除给以一般的抗战知能、政治教育以外,应该用较大的力量来加紧他们识字,使普遍得到获取知识的工具——文字”。对于知识分子主要是“组织他们(如俱乐部里、读报、政治讨论等组织),发动他们进行集体政治的自我教育”。边区还强调社会教育要特别注意到妇女教育,“因为以往封建意识浓厚,今后应加紧注意。妇女教育特别落后,现在一般的妇女还不肯同男子在一起上课,我们可以把她(们)暂时分开,另设女班”^①。表明边区政府在革故鼎新的同时,也照顾到了传统社会的影响力。

三 根据地的政治动员

培养和加强边区民众的民族意识,动员广大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是根据地一项最重要的政治动员,即通过社会教育把一些新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民族和国家意识、党的政策及奋斗目标灌输给民众,激发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进而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抗战必胜的信心和抗战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因此,需要把对民众的政治启蒙渗透在扫盲教材之中。1940年,边区编写的冬学识字课本《边区民众读本》,是利用“三字经杂字”等旧的形式编成的,包括《抗日三字经》、《实用四言常识》和《新五言杂字》三部分,还附有一些散文译述和日常应用文。这些教材通过浅显易懂的文字和群众习惯接受的形式,再经过教员的讲解,使民众懂得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政策、一般的战争常识和军事常识。如政治课要求“懂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般政治常识及目前的抗战形势”;自然课要求“懂得防空防毒、救护及日常生活的科学知识”;军事课要求“懂得怎样打游击战争,怎样维持后方,怎样坚壁清野等”^②。在对民众的政治动员中,边区派往各地的小学教师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是学龄儿童的老师,也担负着各种成人教育的任务,“一位小学教师就等于各农家的常年顾问,他们如像分布在每一个角落的文化据点,把延安的号令贯注到一家一家去”^③。

为了动员民众,使民众对抗战战争和党的政策有更多的了解,读报、办板报和组织民众参加实际的抗战活动是政治动员的主要手段。读报是边区群众最普遍的活动,包括一些变工队、扎工队、合作社等民众的经济组织都有读报组,把读报活动搬到了田间地头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一位参观边区的民主人士这样描写

①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25页。

②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31页。

③ 赵超构:《延安一月》,新民报馆1946年版,第160页。

边区的读报活动：“在工厂、变工队、运盐队，或妇纺小组，由一个会读报的人每天拿群众报念给大家听，并且加以批评解释，进行时事教育。宣传效果似乎很大，报纸上的劳动英雄生产计划的消息，尤其易于引起各地群众的工作热情。”^①边区还在市镇和人口集中的村庄以及通衢大道创办黑板报进行政治动员，主要登载党的政策、政府法令、卫生知识、农作常识、表扬先进、批评落后等等，“成为推动乡村生产、卫生、识字、娱乐、传播新闻与改革旧习惯的武器”。党的政策和新的道德要求就是通过这样的传媒逐渐灌输给广大民众，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凡是有好的读报组和黑板报的地方，那里对政府政策法规和上级号召就容易贯彻，生产教育各项工作就容易开展”^②。

一些办得好的民教馆利用集市、庙会进行宣传活动，如“甘泉城每月六次集，赶集的群众川流不息地赶到民教馆来听时事”；庆阳县民教馆创造了在庙会建立“文化大棚”的社教形式，“历来来赶庙会成了民教馆的中心工作之一。庆阳县每年大小庙会有七八十次……民教馆在这些庙会上，都进行了棉花打卡、发展纺织、卫生（着重妇婴卫生）、时事等宣传工作。采取文化棚，散分宣传画报形式，带着各种表情讲解国家大事、生产、卫生常识，并实地教给群众棉花打卡、纺织，群众很感兴趣”^③。有的俱乐部组织民众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帮助抗日军人家属做工，如砍柴、担水、推磨、宣传等，使军人家属好好的过日子，减少军人在前方惦念家庭。另一方面使军人家属觉得子女去打日本是光荣的”^④。

冬学在政治动员方面显示了一定的优势，不仅在课堂上进行宣传教育，而且把教育与抗战动员的实际结合起来，使“冬学运动与抗战动员工作取得了密切的联系，教育与政治完全打成一片。这样不但帮助了动员工作，且帮助了教育工作，许多教员学员都参加实际的动员工作（如归队动员、征收救国公粮等），学员在工作中学习，教员在工作中指导，真正的实行了国防教育”^⑤。实际上，抗战时期的征兵、征粮、募捐、选举、减租减息、支援前线等社会动员，都是通过这样的场合进行的，使民众懂得了这些工作的意义。

戏剧是“社教的最好工具，不论抗战动员、改良社会风俗、提倡教育它都是有力的宣传武器”^⑥。根据地在社会教育中尽力发挥戏曲在政治动员上的功能，整风运动后，中共更加注重戏曲的政治教育作用，1943年中共中央文委确立了戏

① 赵超构：《延安一月》，第161—162页。

② 《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决议》（1944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1945年1月11日。

③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193页。

④ 吕良：《边区的社会教育》，《战时教育》第2卷第9期，1938年4月25日。

⑤ 吕良：《边区的社会教育》，《战时教育》第2卷第9期，1938年4月25日。

⑥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第73页。

曲运动“为战争,为生产及教育服务”的总方针^①。为了使剧团能够为抗战的政治动员服务,边区不仅成立了新的剧团,而且对民间旧的秧歌队、社火队、皮影班子等进行了改造,加强了党对戏剧的领导,一方面对“各剧团负责人均加以政治上的审查”,一方面“派好的党员去担任剧团的政治领导”^②,使戏剧的内容符合党在抗战时期的政策,以引导民众趋向于合乎中共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特别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后,边区的文艺工作者走上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开展了文艺下乡运动。1944年春节,“延安文艺工作者大批下乡,宣传生产劳动,军民关系,自卫防奸,敌后斗争等,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称为‘斗争秧歌’”^③。这种“新秧歌所给予观众的,主要是‘应当怎样’和‘不应当怎样’。它把共产党所要求的事情化为故事,再加上艺术的糖衣。因此新秧歌所表现的,当然以生产战斗,‘拥军’等等故事为多”^④。庆环分区(1940年8月与新建立的陇东分区合并)剧团在工作总结中写到:“它是把党对于抗战的主张广播给群众,把边区一切抗战建国的模范作风都反映给群众去学习,把汉奸汪派出卖民族国家利益的行为揭穿给群众看,把日寇的疯狂性的事实给群众赤裸裸的演出,大大激发了群众仇奸杀敌的气愤。”剧团“每在公演的地方,挤出时间,向群众口头宣传和解释,要他们了解捐公粮和扩大新兵关系抗战和保卫边区的需要,不用讲是鼓动了激发了群众捐公粮和参加部队的积极性”^⑤。边区的文艺工作者深入乡村,用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编排了《兄妹开荒》等许多具有很强教育意义的戏曲。弘扬民族主义是戏曲的主题之一,同时,“积极生产、公而忘私、勤劳持家以及孝敬老人、爱护儿童都成为抗日根据地农村宣传和戏乐活动所要弘扬的主题。相应的,二流子懒汉、为富不仁者、吸食鸦片者、不孝敬父母者、虐待儿童和妇女者等不良人,都成为讽刺、抨击的对象”^⑥。戏曲里所褒扬的那些被认为是进步的行为,逐渐成为普通民众日常行为的道德准则,而这些准则和中共所倡导的意识形态完全是一致的。

利用重大节庆或纪念日组织民众集会,是边区进行教育和政治动员的一种形式。在1942年7月,抗战爆发五周年纪念期间,边区各地纷纷组织集会,对民众进行教育和政治动员。陇东分区在庆阳县举行了民众集会,分区领导进行了

① 本报特讯:《中央文委确定剧运方针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解放日报》1943年3月27日。

② 《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文委关于改进剧团工作的指示》(1943年4月25日),《解放日报》1943年4月30日。

③ 《李鼎铭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④ 赵超构:《延安一月》,第108页。

⑤ 《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内部资料1992年印行,第148页。

⑥ 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页。